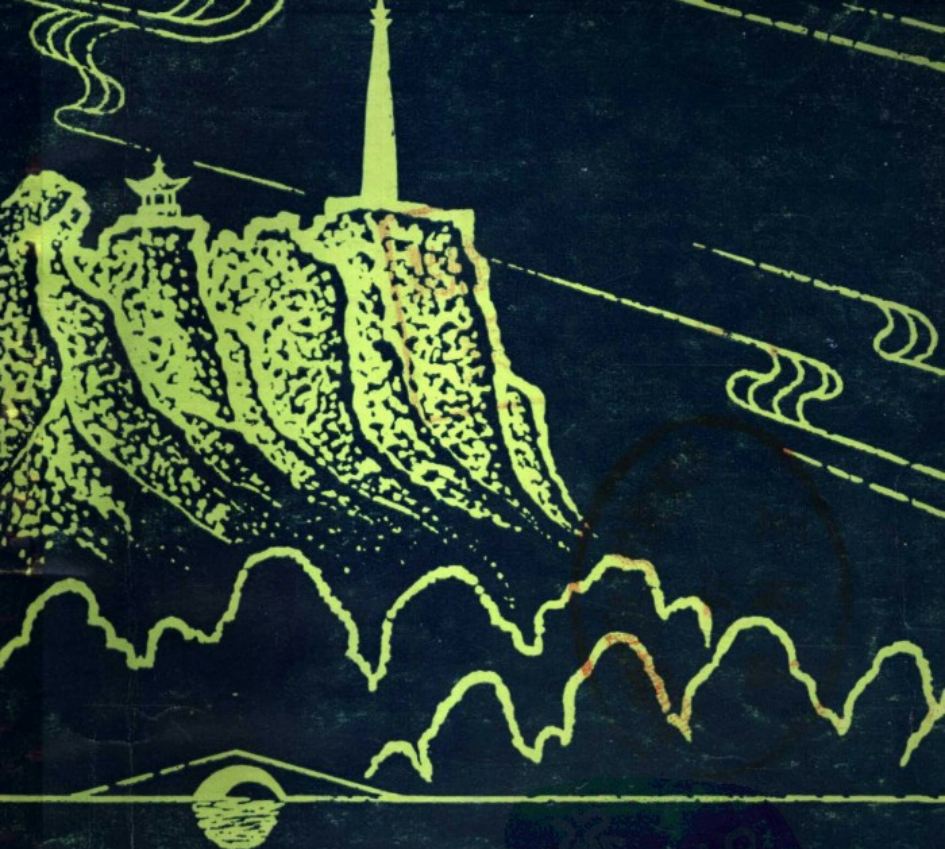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杭州地方志資料

第三輯

杭州地方志资料

第 三 辑

（内部资料）



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印

1987年12月

编 者 的 话

自从中共杭州市委、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编纂新的“杭州市志”，并发出关于征集“杭州市志”资料的公告以后，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和各修志单位已陆续搜集到不少史志资料。为了充分发挥这些资料的作用，满足各修志单位的需要，以及进一步发掘和考证资料，以便更好地为编修新的地方志服务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，决定不定期编印《杭州地方志资料》。

本《资料》主要刊载有关杭州市的旧志史料；民国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的调查材料；经过初步整理的专题资料长编和历史人物传略等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资料收集比较困难，即使已收集到的资料大多比较零碎，整理工作相当复杂。再加上我们水平有限，不到之处一定很多。希望广大修志工作者和专家、学者，提出宝贵意见，并积极提供稿件，以便不断提高本《资料》的编辑质量。

杭州地方志资料

目 录

1. 杭州沿革概况..... (1)
 附：历代建置沿革表..... (19)
2. 民国杭州大事记资料 (1911—1919) (43)
3. 回忆之江大学..... (114)

杭州历史沿革概况

骆 寄 平

杭州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，是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，是浙江省的省会，全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它历史悠久，风景秀丽，人文荟萃，物产丰富，素有“鱼米之乡”、“丝绸之府”、“文物之邦”、“旅游胜地”之称，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篇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早在四、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，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。从1935年起，市区老和山麓（今浙江大学一带）及向西北延伸，经古荡、勾庄、水田畈，直至余杭县的良渚、长命桥、瓶窑、彭公一带，曾多次发现新石器晚期时代的原始村落遗址，考古学家称之为“良渚文化”。接着，太湖流域和东海之滨也陆续密集发现遗址。当时这里的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，兼营渔猎、畜牧业和采集野生植物或果实，维持生活，并广泛使用独木舟作为水上交通工具。手工业以黑陶和玉器最为著名。所制造的黑陶，形状规则，造型优美，胎壁较薄，黑色光亮，品种丰富多彩，成为良渚文化的特征。玉器技术水平也很高，在各地出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，不仅发现以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作装饰用的璜、琚、环、坠、珠等玉器，还出现众多作为礼器的巨型玉琮、玉璧。这些玉器，雕琢精致，图案美丽，有的还有饕餮纹和云雷纹等。玉琮、玉璧原是商、周奴隶社会国家中，祭祀天地的贵族礼器。这说明良渚文化时期，贫富正在分化，正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

社会的过渡时期，也进一步证实长江流域、东海之滨、钱塘江两岸，同样也早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源地。相传，夏禹治水成功，于会稽山（今绍兴）大会诸侯，曾在杭州“舍杭（航）登陆”（古代以方舟称杭），故杭州古称为“禹杭”。

据《禹贡》记载，杭州为“扬州之域”。春秋时，杭州是吴、越两国争霸的地方，先属吴，后归越。现在杭州市区西南部的吴山（俗称城隍山），相传，就是当年吴国的国界而得名。战国时，杭州先属越，后并于楚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相传在灵隐山麓天竺谷地设县治，称钱唐县，属会稽郡。现在的市区平陆，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，西湖尚未形成。《史记·秦始皇记》载，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东巡会稽，“过丹阳，至钱唐，临浙江，水波恶，乃西百二十里，从狭中渡。”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。

西汉承秦制，仍称钱唐县，先隶属扬州，后又归会稽郡管辖。汉武帝时钱塘江道南移，西湖东部变成平陆，朝廷把会稽郡西部都尉治（郡一级的治安、军事管理机关），从山阴迁到钱唐县。新莽（公元9年）时，改钱唐县为泉亭县。到了东汉，初称钱唐县，又入余杭县。顺帝永建四年（公元129年）分会稽浙江以西为吴郡。东汉末，复置钱唐县，再属吴郡。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。汉曹华信，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海塘，西湖开始与海隔断，成为内湖。

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，北方人民因战乱而纷纷南迁。三国吴大帝孙权黄武五年（公元226年）分置东安郡，治富春，

杭地属。七年，撤东安郡。吴末帝孙皓宝鼎元年（公元266年），分置吴兴郡，钱唐县属。晋王朝因鲜卑族相继入侵，被迫从洛阳迁都建康（今南京）。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南迁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，促进钱塘江下游两岸的经济发展。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十年（公元289年），封皇子司马晏为吴王，杭地属吴国。东晋咸和元年（公元326年），中天竺国（古代印度的一个国家）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，创建了灵隐寺。永和二年（公元342年），方士许迈在武林山筑起“思真精舍”，写了十二篇关于神仙的诗篇，当时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常从会稽来访。随晋室南迁的葛洪，在韬光、宝石山一带进行炼丹活动，这些宗教的传播，是杭州文化的创始，也是西湖名山胜水的第一次开拓。南朝刘宋元嘉年间（公元424年至453年），刘道真在《钱唐记》中述：“昔一境逼近洪流，而县在灵隐山下，至今基址犹存。”永明四年（公元486年），桐庐唐寓之领导的起义军，反萧齐，攻入钱唐县，自号“吴国”，定都钱唐，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。

梁武帝太清三年（公元549年），升钱唐县为临江郡。南朝陈祯明元年（公元587年），陈后主又置钱唐郡。

隋开皇九年（公元589年），杨坚灭陈。实行郡县二级行政区制度，废郡为州，始称杭州。下辖钱唐、余杭、富阳、盐官、于潜、武康六县。州治初在余杭，次年，迁至钱唐东南凤凰山麓的渡口柳浦（今江干区一带）。开皇十一年（公元591年），隋大臣杨素在杭州凤凰山依山筑城，“周三十六里九十步”，东靠盐桥，西接西湖东岸（今湖滨路一带），北至钱塘门（今六公园附近），现今吴山和西大街都

在城外。大业三年（公元607年），改置余杭郡。大业二年（公元610年），隋炀帝杨广利用天然河道和旧有渠道，开凿了从现今江苏镇江起，经苏州、嘉兴而达杭州的江南运河，与北运河沟通。当时江南运河与杭州茅山河相通。茅山河又连接钱塘江，海外船舶从杭州湾钱塘江转入运河，北去苏州、扬州、天津、北京。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终点，重要的地理位置，促进了经济、文化的迅速发展，揭开了杭州海外贸易的序幕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述：“杭州诸郡‘川泽沃衍，有海陆之饶，珍异所聚，故商贾并臻。’”

唐代，唐高祖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为避国号讳，改钱唐县为钱塘县。杭州初属江南道，后归江南东道、浙江西道、两浙道，管辖钱塘、盐官、富阳、新城、余杭、临安、于潜、唐山诸县，社会经济日趋繁荣，成为“东南名郡”。据《乾道临安志》记载：“自陈置钱唐郡，隋废郡为杭州，户15,380；唐贞观中（公元627年至649年），户30,571；口158,729；开元中（公元713年至741年），户86,258。”城市中心从城南凤凰山麓逐渐向北延伸到武林门一带。武林门当时已成为运河两岸州县货物集散地。唐李华《杭州刺史厅壁记》称：“山牵卉服，陆控山夷，骈楹二十里，开肆三万室。”这时杭州、广州和扬州已列为全国三大通商口岸。诗人杜甫诗句：“商胡离别下扬州，忆上西陵故驿楼”（西陵即钱塘江北岸萧山县的西兴镇），正是当年的写照。大历年间（公元766年至778年）李泌任杭州刺史，在今涌金门与钱塘门之间的平陆上开凿了六口大井，即：相国井（今井亭桥边）、西井（在相国寺边）、方井（俗称四眼井）、金牛池（在西井之西北）、白龟池（今龙翔桥西）、小方井（在

钱塘门内)，掘地为沟，用竹管引西湖水入城，解决城区居民饮用淡水问题，城市中心，逐渐从钱塘江畔移向西湖之滨，从此，进一步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础，为开发和建设西湖创造了条件。长庆二年（公元822年），著名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，浚湖筑堤，治理城市，从钱塘门到武林门修筑了一条长堤，分西湖为二，堤内为上湖，堤外为下湖，与城郊田野相连，解决了钱塘、盐官（今海宁县）之间数千顷良田的灌溉问题。又重修六井。使杭州日益繁荣，成为四方辐辏，海外交通便利的郡城。在诗人笔下，这时的杭州是“余杭形胜四方无，州傍青山县枕湖，绕郭荷花三十里，拂城松树一千株。”的风景优美城市。

五代时，后梁龙德二年（公元922年）分钱塘、盐官、富阳地设钱江县。龙德三年，镇海军节度使钱鏐建立吴越国，以杭州为国都，历时72年。吴越国王钱鏐对国都的建筑，在唐代已有城垣的基础上，精心擘划，大加扩展。在凤凰山下筑“子城”，外建“夹城”和“罗城”。子城内建宫殿，设南、北两门，南称“通越门”，北名“双门”，“皆金铺铁叶，用于御侮。”在子城之北，面临大江，建造“碧波亭”，为钱鏐阅水军之处。钱鏐在建都以前，为了巩固地盘，加强防守力量，对杭州旧城曾两次进行扩建。第一次是唐昭宗大顺元年（公元890年），筑新城，环绕包家山，至秦望山，计50余里，称夹城。第二次在景福二年（公元893年），动民工二十万，在夹城外再筑罗城（又称城外城）。把城垣扩展到周围70里。《吴越备史》记载，大城西起秦望山，沿钱塘江至江干，西濒钱塘湖（即西湖）抵宝石山，东北面达艮山门。形似腰鼓，又有“腰鼓城”之称。建城时，钱鏐不听信

许多方士“填西湖，建府治，垂祚万年”之献策，却置“撩湖兵”千人，日夜疏浚，保护西湖不被葑草淤塞，使西湖这颗明珠越发光彩。同时，为了发展农业，保护城邑，他重视兴修水利和修筑海塘，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，在钱塘江沿岸，采用先进的“石围木桩法”，用木桩为棹柱，竹笼装巨石，修筑了长达百余里的护岸海塘，号称“捍海塘”。同时，又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、浙江二闸，有效地阻止了咸水倒灌，促使滨海斥卤土地逐渐淡化，城区内河免受潮汐干扰，减轻了潮患，扩大了平陆，发展了海运。自东晋以来，杭州素有“佛国”之称。吴越国王笃信佛教，环湖创建、兴修了大批寺宇。据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记述：“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，唐以前为三百六十，及吴越立国，宋室南渡，增为四百八十，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。”这一时期，创建了名列西湖“四大丛林”的昭庆寺、净慈寺，及九溪理安寺、赤山埠六通寺，上天竺法喜寺、吴山宝成寺、北高峰韬光寺、月轮山开化寺、灵峰灵峰寺、云栖云栖寺，扩建和改建了灵隐寺、中天竺崇寿院、玉泉净空院等，建造了保俶塔、六和塔、雷峰塔和白塔，凿雕了飞来峰、烟霞洞、慈云岭等处的摩崖石刻。一瞬间，“山绕重湖寺绕山，红阁碧瓦点翠峦”为西湖增添无限风光。经过吴越三代五帝七十二年的开拓建设，杭州的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。吴越的纺织业、造纸业和瓷器业盛名于全国。海外交通，与日本、高丽（朝鲜）、大食（阿剌伯）等国的贸易关系也先后建立起来，专门设立了“博易务”管理对外贸易。杭州已一跃为“两浙十三洲一军”（相当于今浙江省加苏州和福州）的中心，是全国经济繁荣，文化荟萃的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。”欧阳修《有美

堂记》，称赞吴越都会杭州盛况时说：“独钱塘自五代时，知尊中国，效臣顺，及其亡也，顿首请命，不烦干戈，今其民幸福足安乐。又其俗习工巧，包屋华丽，盖十余万家。环以湖山，左右映带，而闽南海贾，风帆浪拍，出入于江涛浩渺，烟云杳霭之间，可为盛矣。”苏东坡在《钱氏表忠观碑》中也述：“吴越地方千里，带甲十万，铸山煮海，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。”

北宋时，杭州隶属两浙路。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。经济更为繁荣，已跃为万物富庶的“地有湖山美，东南第一洲”。太平兴国四年（公元979年），吴越归宋后，改钱江县为仁和县，与钱塘县并属杭州府治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记述，徽宗崇宁年间（公元1102年至1106年），杭州人口已达203,574户，超过江宁（今南京）、平江（今苏州）诸地，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。城市发展迅速，朝廷在杭州设置“织务”（专门管理与收购杭州及附近州县丝织品的机构），至道元年（公元995年）后，每年收购绢帛高达25万疋，占浙东七州的三分之一强。雕版印刷居全国之首，酿酒、造船、造纸等业也很发达。“天下酒官之盛，未有如杭者也，岁课二十余万缗（一缗为一千文）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熙宁十年（公元1077年）前，杭州每年商税12万贯左右，当年商税高达17.38万贯，超过江宁府、成都府、广州南海郡，比东京（今河南开封）、西京（今河南洛阳）、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、北京（今河北大名）等路还多。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。端拱二年（公元989年），设置了杭州市舶司。沿钱塘江、运河两岸，形成南场、北关、安溪、西溪、范浦、江涨桥、汤村、临平等城郊经济网络。对西湖，北宋历任杭州的

地方官都十分重视，在唐、五代开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兴修水利，疏浚湖床。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元祐四年（公元1089年），著名诗人苏东坡先后任杭州通判和知州，他为排非议，再度疏浚西湖，向朝廷呈《乞开杭州西湖状》，依靠朝廷拨给的一百道僧人的“度牒”，卖款一万七千贯，加上救荒余款，以工代赈，雇工开撩，用工二十万，开掘淤滩二十五万丈，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，上架六桥，夹道种植桃柳，并立三塔，修六井，使西湖更加美化，人民生活更为方便。当时，杭州有“地上天宫”之称。诗人把西湖比喻为我国古代的美女西施写下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的千古绝句。元祐五年（公元1090年），僧子珪再次修六井，用瓦筒换下原来的竹管，盛在石框内，进一步改善居民用水。次年，林希任杭州知州，对苏东坡所筑之堤，题“苏公堤”三字匾，后人称为“苏堤”。

南宋时，杭州隶属浙西路。靖康二年（公元1127年）“靖康之变”，女真贵族率金兵侵占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俘虏了徽、钦二帝，赵桓之弟高宗赵构，狼狈逃到杭州，建炎三年（公元1129年），以杭州为行在所，升为临安府。绍兴八年（公元1138年），正式建都于此。历时150余年。杭州成为南宋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。都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，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。南宋的杭州市分内城和外城。内城，即皇城，方圆达9里，环绕着凤凰山，北起凤山门，南达江干，西至万松岭，东自候潮门。皇帝住的“大内”和皇家花园“禁苑”，亭台阁榭，楼院层叠，巍峨壮丽，光耀溢目。外城，南跨吴山，北到武林门，右连西湖，左靠钱塘

江，气势宏伟。城墙四周开设了便门、候潮门、保安门、新门（即草桥门）、紫新门、东青门、艮山门、钱湖门、清波门、丰豫门（即涌金门）、钱塘门、嘉会门、余杭门（即武林门）等13座城门。这时杭州的人口，因“高宗南渡，民工兵者如归市”，“中原士民，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。”北方人口又一次大南迁，使临安人口激增。北宋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杭州居民不过10余万户；南宋孝宗乾道年间（公元1165年至1173年），居民增至261,692户，人口552,507人；到南宋末期的咸淳年间（公元1265年至1274年），居民数增至391,259户，人口达1240,760人。城区人口日益增多，空荒之地逐渐变成繁华街巷。《梦粱录》云：从西湖东望，但见“独东偏无山，乃有鳞鳞万瓦，屋宇充满”，“居民屋宇高森，接栋连檐，寸尺无空；巷陌壅塞，街道狭小，不堪其行。”杭州当时已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大都市，西子湖畔已是“一色楼台三千里，不知何处觅孤山”。

人口的激增，给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带来了条件。南宋杭州经济的繁荣，不仅超越前代，而且居于世界前列。当时号称“杭州八景”之一的北关夜市（今武林门外），在《咸淳临安志》“宋朝西湖图”中画的“秀州埠头”，人来货往，非常热闹。贯穿城区南北的“御街”，长达13,500余尺，两旁店铺林立，繁华至极。在北关白洋湖一带，仅榻房（今旅馆）就有数千间。著名的“行”、“市”，有义和坊药市、寿安坊花市、余杭门外米市、修义场肉市、东青门外菜市以及候潮门外鱼行与猪行等。城门口附近和护城河桥头，成为城乡物资的交换和集散中心。所谓“东门菜、西门鱼、南门柴、北门米”的民间谚语，反映了当时农

产品贸易情景。手工业丝绸、印刷、造船、造纸、纺织、瓷器、酿酒、食品等十分发达，出现大量手工作坊，遍布杭城内外，吸引国内外商贾。其中特别是丝绸业，更是兴隆非凡，各地商客，争相竞购。当时除官营的织锦院外，私人经营的作坊，遍及深巷僻弄。“竹窗轧轧，寒丝手揆，春风一夜，百花尽发。”正是当时生产盛况的写照。水上运输也很发达。钱塘江上的江船，上溯严、婺、衢、徽各府，输入柴炭、竹笋、干果等山货，于杭州湾的海船，以城东澉浦镇为商业外港，来往于台州、温州、福州诸沿海港口，甚而远行至日本、朝鲜和南洋各国。南宋朝廷为接待外宾，在候潮门附近建“郝亭驿”，在武林门附近设“怀远驿”，专供外国使节和商人住宿。当时，杭州还设立南宋的最高学府——太学，还有武学、医学、算学、历史等各专科学校。全市还有固定演出戏剧、杂技的瓦子（如游艺场）达23所。西湖园林除凤凰山麓的御园，还在南北两山，京城内外，开辟了多处皇家园林。流传迄今，蜚声中外的“西湖十景”开始形成。

“天上天堂，地下苏杭”的美称，此时产生。

元代，朝廷诏令降临安府为杭州路。为浙江行省省治所在地。元统治者拆城墙，焚皇宫，繁华的杭州城经历了一场浩劫。黄缙诗云：“行宫故宛游糜鹿，漫拈空山号凤凰。”写出了行宫帝阙，繁花锦苑，转眼变为荒坟断碑，衰草野地的凄凉情景。西湖四周泥土淤塞，湖西一带葑草蔓合，高者为田，低者为荡，阡陌纵横，尽为桑田，苏堤以东，湖水仅留一线。豪强侵占湖面，筑起篱笆，种植菱芡。大的游船，已不能通行。环山寺庙，不少毁坏。至元二十七年（公元1290年），杭州居民户数降至360,850户，但城市繁华热闹

依旧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在此时来游杭州，他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仍称赞杭州是“天城”，是“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”，“人处其中，自信为置身于天堂”。文化艺术上，杭州的印刷业有新的进展，出版的书籍“刻印之精，为诸路冠”。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黄公望，隐居西湖，作画于湖山之间。首倡《西湖竹枝词》的杨维禎，居于吴山铁冶岭，写下许多优美的西湖赞词。杂剧也有发展，涌现出金仁杰、范康、施惠、王骥等十多位杭州剧作家。从文化艺术上反映，杭州的经济仍是东南之首。至正十九年（公元1359年），张士诚割据浙西五郡，举反元义旗。张士诚弟张士信出任浙江省平章政事，重建杭州城，发民兵数万，昼夜施工，三月而成。据钟毓龙《说杭州》记述：新建之城“自钱塘门而北，宋之九曲城则改而直之，仅留一曲。此西南之改筑也。北方余杭门仍其旧，而增设天崇、北新二门。天崇门即因宋之水门而改作者。东方自艮山门至候潮门，则向东展拓三里，而络市河于内。废去保安门。东方则自候潮门以西缩入二里，截凤凰山于外。废去嘉会、东便二门，而即以和宁门为南门。西南之城，则跨清平、金地两山之上，北接清波门，而钱湖门在山上矣。清波门北至涌金门之城，亦微向西拓。定水寺本在清波门外，以筑城而移于七宝山，其证一也。民国之初，拆卸城垣，于此一带之下发现宋时回回坟甚多，其证二也。东青门外所展拓之门，名曰庆春，亦曰太平，以门内有太平桥也。崇新门外所展拓之门，名曰清泰，仍宋之旧。以门内有螺蛳桥，故俗以螺蛳门呼之。新门外所展拓之门则曰永昌门。”张氏所建的城垣，为杭州近代城区的规模奠定了基础。

明代，杭州府隶属浙江布政使司。明初，经过一段时期的修建复苏，洪武九年（公元1376年），人口上升为193,35户，20,587人。洪武十四年（公元1381年），杭州为浙江行省的省会。在西湖治理方面，弘治十六年（公元1503年）四川杨孟瑛任杭州知府，继白居易、苏东坡后，又一次大规模地疏浚西湖，用银二万多两，将苏堤增高五二丈，加宽至五丈三尺，苏堤以西，一直浚到山麓为止，恢复了唐、宋的旧观，西湖重现“湖上春来水拍天，桃花浪暖柳荫浓”的秀丽景色。明代对西湖园林建设增色不少。嘉靖三十一年（公元1552年），杭州知府孙孟在北宋湖中三塔之北塔遗址上，建报鹭亭，堆筑了湖中第一座绿岛，后改称清喜阁，为今湖心亭前身。万历年间（公元1573年至1620年），孙隆整修白沙堤，种植四季花木，两岸砌筑白石，中间铺沙。万历三十五年（公元1607年），钱塘县令聂心汤在三塔南塔原址，取葑泥作堤，建放生池。万历三十九年（公元1611）年，钱塘县令杨万里在放生池外筑外堤，建造一座九转三回、三十个弯的九曲桥，建成“湖中有岛，岛中有湖”的小瀛洲（三潭印月）。天启元年（公元1621年），在小瀛州南，湖面上建三塔，“三潭印月”美景由此形成。西湖的整治，社会的安定，因此万历年间的杭州，又是四方商贾云集。游人纷至沓来。《万历杭州府志》述：“嘉靖初年，市片委巷，有草深尺余者，城市西僻有狐兔为群者，今民居甚比，鸡犬相闻，极为繁荣。”

清代，地方行政制度承袭明代，杭州隶属浙江布政司。以乾隆年间（公元1736年至1795年）最盛。据《乾隆杭州府志》载述：乾隆四十九年（公元1784年），杭州人口为445,943户，2075,211人。清初，杭州城的最大变化是顺治五年（公

元1648年），统治者傍西湖建旗营，俗称“满城”。满城建有城墙，城高1.9丈，周围10里，南至今开元路，北靠今法院路，东临中山中路附近，西面包括湖滨公园。辟有城门六座：东为迎紫门（在今解放路中段），南为延路门（在今延安路东段），西北为承乾门（在今小车桥附近），西北角为钱塘门（在今湖滨路北段），东北角为拱宸门（在今岳王路北段），总占地1426亩，为杭州的“城中城”。旗营的最高长官“将军署”，在今市人民政府和人民大会堂所在地，湖滨公园一带是“旗下营”的兵马操练场。清代杭州城垣的十门不变。民间编称：“北关（即武林门）坝子（即艮山门）正阳门（即凤山门），螺蛳（即清泰门）沿过草桥门（即望江门），候潮闻得清波响，涌金钱唐共太平（即庆春门）。”康熙元年（公元1662年）改浙江布政司为浙江行省。省治杭州等十一府。省与府间设道，杭州府隶杭嘉湖道。

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，清代皇帝多次巡幸江南。康熙执政61年，乾隆在位60年中，都南下杭州，亲临西湖各6次。两帝巡游的奢侈生活，加深了江南和杭州人民的困苦。在另一方面，也增添了西湖不少名胜古迹。康熙二十八年（公元1689年），孤山建行宫，疏浚涌金河，通御舟，御笔题南宋西湖十景景诗，于康熙四十年（公元1701年）刻石立碑建亭。“曲院风荷”等原已湮没的景观，这时易地重建。乾隆四十七年（公元1782年）将康熙行宫“圣因寺”内的玉兰堂藏书楼，改建为收藏《四库全书》的文澜阁。浙江的地方官为博取皇帝的欢心，对西湖也大大修整经营一番。雍正二年（公元1724年），浙江总督李卫疏浚里外西湖11,315亩。嘉庆五年（公元1800年），浙江巡抚阮元